

人民军队 纪律制度建设的历史演进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周通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副教授 蒋瑛

人民军队自建军之日起，就非常重视革命纪律，并严格执行统一的纪律，这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也正是因为有了铁一般的作风纪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才能在革命战争中获得人民群众真心的拥护和支持，才保证了党和人民军队在挫折失败中奋起，不断走向新的胜利。纪律制度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军队革命斗争的历程不断发展完善，军纪的内容也不断拓展。人民军队从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其纪律制度与时俱进，在破与立之间持续向前发展。

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帮助中共获取并掌握政权的重要保证，纪律严明是这支军队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法宝。人民军队严明的纪律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出来的。在经历革命战争以及和平建设之后，人民军队的纪律逐渐形成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

一、早期探索阶段：战争时期军队纪律制度建设与发展

武装力量对政党的作用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在经历大革命的失败后，认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人民军队从无到有，其纪律制度也从无到有，在进行革命战争的同时进行着纪律制度的探索建设。这个时期由于战斗十分频繁，

纪律建设尚属起步和创立阶段,当时的纪律制度建设带有简易性和应急性的特点。

(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一军规”的提出

上世纪初社会纷乱,国家政治局面四分五裂,多种武装力量纷纷登台:有清末旧军阀的残余,有国民党新军阀的各种派系,有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土匪。这些反动武装都是以剥削、欺压、掠夺人民群众来维系生存的,群众普遍惧军、仇军,见了军队就跑。对新出现的红军,群众也很不了解。初创时期,红军内部成分复杂,斗争环境险恶,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部队像一把豆子,手一松就散了”,战斗力低下,扰民事件时有发生。1927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湘赣交界的罗霄山脉深处,向革命队伍宣布了三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就是人民军队“第一军规”的起源。严明的纪律比讲千言万语都更能打动群众、说服群众。红军长征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有很多穷苦的少数民族青年积极参加红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亲眼目睹了红军和旧军队纪律的截然不同,由此认定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毛泽东把军纪与军队担负的政治使命相结合,指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把政治纪律视为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的原则问题。战时军纪的政治性,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维护军队高度集中统一和稳定,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军队高度的纪律性宣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是一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军队,是一支由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军队,是一支

1935年5月,红军将领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在海子边歃血结盟,使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图为画照《彝族结盟》



与广大人民群众鱼水相依的军队。纪律严明铸就了强军之魂,造就了一支革命铁军,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和中央苏区的巩固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最初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经过不断发展进而演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30年10月下旬,中央军委参照苏联做法,制定了包括《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令草案》在内的4部条令草案。该草案主要阐明纪律的重要性,明确各级奖惩的权限草案,后来又修订为《红军纪律条令草案》,于1932年5月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试行,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部《纪律条令》。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被称作人民军队的“第一军规”。它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军队“战场纪律”的发展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高度集中统一的日军,人民军队需要更加严格的战场纪律。1940年9月,在一份《津浦路东反日

伪“扫荡”总结》分析我方的缺点时指出：游击主义习气尚未克服，如军纪不严，执行命令马虎、不坚决、打折扣，组织松懈，对公物不爱惜，随便丢失，没有射击指挥与射击纪律。一些干部以个人的勇敢去进行单个战斗，忘却了自己是指挥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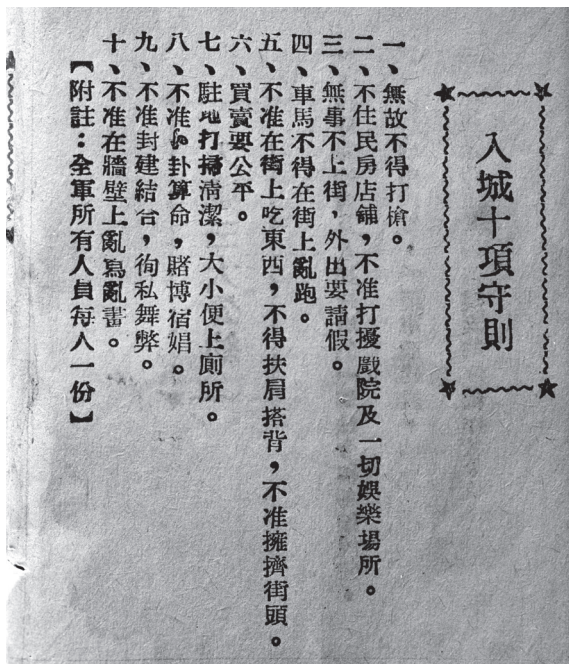
[1]1941年7月，陈毅深刻反思了新四军的9条弱点，包括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注重局部利益的本位主义，执行命令不坚决，纪律不严格，忽视军事纪律、战场纪律等，并称这些现象在全军各部队说来只有程度上的不同，绝无根本例外。这说明本军现有力量尚未达到组织得更好，教育得更好，训练得更强的水平，必须要求更进一步来建设自己改进自己。这些弱点在具体战役中时或出现，1941年10月的《程道口战役详报》中指出：战斗识别和战场纪律差。比如在战斗进行中，识别记号不明显，不统一，发生误会。又如攻占阵地后，乱搜民家物品和争俘虏兵的不好现象。[2]1942年2月，陈毅又指出现在的弱点包括某些部队中游击习气和军阀习气的残余仍未根本纠正，在实际工作中仍占着上风。干部逃亡及犯严重错误如贪污腐化堕落倾向的分子，总数约400余名。军事纪律、群众纪律、经济纪律尚未做到严明整肃。

在毛泽东创造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础上，八路军政治部颁布了《八路军抗日三大纪律》，包括服从上级指挥、不拿人民一点东西，这是人民军队强化纪律意识的明证。凡违反军纪和法规的，不管是谁，都应依据军纪和法规处置。抗日战争时期颁发的《纪律条令》规定了战场纪律、内务纪律、教育纪律、群众纪律等内容。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对轰动一时的黄克功事件的处理态度上，彰显了党和军队领导人锻造人民军队公正无私、纪律严明品性的意志和决心。1944年1月5日到6日，在新四军第1师第18旅司令部的一份战斗总结中，记载战场纪律确实严格了，除个别分子外，绝大多数都是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毫无犹豫与畏缩。即使错乱建制，亦能听从指挥。在不断审视自身问题，并积极改善的过程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步步养成了铁的纪律意识，实现了党和军队纪律严明的一贯要求。

（三）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入城纪律”的创建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军的主要竞争是争夺城市。而人民军队之前的根据地一直在农村，在接管城市这一方面还不够成熟，发生一些混乱，采用当年红军打下城市时开仓济贫的做法，不仅破坏了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更是引起了官兵的仇视错误思想和资本家的恐慌。解放城市是要利用城市组织生产力，发展生产，将更多的物资支援解放其他地区的战争，对待城市的政策不是破坏而是维护建设。时任东北军区政委罗荣桓要求部队要普遍进行纪律政策教育，检讨过去违反城市政策的行为。后来根据罗荣桓的意见，颁发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8条《入城纪律守则》，这8条规定经中央军委批准转发全军，要求各部队参照执行。[3]1949年3月，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编印《城市常识》，以使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士兵尽快掌握城市的特点，更好地执行保护和建设人

华北军区在平津战役后编印的《入城十项守则》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28页。

[3] 洪旗：《解放军〈入城纪律守则〉制定内幕》，《党史纵横》，2004年第10期，第20页。

民城市的政策。陈毅曾专门向军队和接管干部做入城纪律报告，并指出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基础。在接管上海之前，要求每个干部战士都要背诵《约法八章》、《三大公约》、《十项守则》等纪律守则，并对执行纪律情况进行审查。全军指战员在解放上海战役中，自觉维护入城纪律，涌现了以官兵为了不打扰上海市民而露宿街头为代表的大量模范事例。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水平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硕果累累，耀眼无比，纪律严明突出展现了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同时也为共产党争取到了民心拥护和政治上的主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克上海。图为进入上海市区的先头部队，为避免惊扰市民，露宿街头

二、全面推进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纪律制度建设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从获取执政权转移到执政后的全面建设上来，人民军队的主要任务从革命战争转移到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配合国家的各项建设上来。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人民军队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内有腐败分子，外有强敌威胁。与此同时，军队的纪律建设急需全面推进。

（一）整风运动期间军队各项纪律的全面建设

由于所处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加上中共分散建军、各地部队自成体系，部队继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等方面的原因，军队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贪污腐化问题。

[1] 决策出台和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加之革命胜利后极易滋生的居功自傲、放松享乐等思想影响，难以避免一些军队干部放松自我要求。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后，毛泽东指出全军通过整风运动教导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不要骄傲自满，不要以功臣自居。

[2]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不仅缩减了军队的规模编制，同时就作风纪律问题进行了整治。前后3次进行整编，发动大批人员进行转业建设，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1952年4月15日，总政治部颁发《关于军队党内处分的暂行办法》，对军队党员和党组织处分的种类、处分的权限及应注意的事项都作了明确规定和要求。“三反”运动进入甄别阶段后，总政治部又发出《关于部队“三反”运动最后阶段几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必须坚决按中央规定的

[1] 范晓春：《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的反腐败斗争》，《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第94—104页。

[2] 《对聂荣臻军事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50年6月1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一般从宽、恶劣者从严，党外从宽、党内从严”的方针予以处理。^[1]

全军“三反”运动于1952年8月底结束，官兵教育、队伍纯洁及时全面。全军团和相当于团以上的单位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该委在上级监委和同级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惩治腐败的相关法规开始建立完善，军队整体特别是贪腐问题高发领域的相关法规制度建设得以全面铺开。在



战士于长安在“三反”运动中，主动向组织汇报情况



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

领导制度方面，军委成立总干部管理部，建立层层节制的干部管理制度^[2]；在财经制度方面，军队的后勤供应必须由分区负责实施转变为集中统一实施，由过去单纯保证军费供给改为组织领导与检查全军一切财政经济行动，开展违反财经纪律的综合检查。1954年8月，军委发出《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要求加强各级干部的领导和监督。1955年1月起，全军又逐次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军衔制和颁发勋章奖章的奖励制度。这些法规制度的配套施行，对于处于平战转换时期的军队而言，从制度环境上有效促进了军队的纪律建设。

（二）对外反击作战期间军队“战场纪律”的完善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军队第一次在境外作战，面对陌生、险恶的作战环境，志愿军既要克服自然条件的不利因素，又要对付美军优良装备的打击。志愿军陆、海、空三个军种和步兵、炮兵、防空兵、坦克兵、铁道兵、工兵、通信兵、卫生部队、后勤部队9个兵种共135万余人参加作战，投入兵器百余种，数量以百万计。因而战场纪律在时空上突破过去战争年代的界限，既涉及人员管理，又涉及装备物资管理，还包含诸军兵种联合协同作战的全方位多维化的内容。毛主席在组建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中要求志愿军入朝作战要严格地遵守政治纪律和军事纪律，要求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们，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要与朝鲜同志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3]

[1] 《军委政治部关于部队“三反”运动最后阶段几个工作的指示》（1952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秘书处《政治工作文件汇编》第2辑，第120页。

[2] 《建立层层节制的干部管理制度》（1950年9月13日），《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757页。

[3] 这是1950年1月19日，毛泽东在修改彭德怀准备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作的报告时，特意加写的一段话。

在严格的战场纪律要求下,人民志愿军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这极大丰富了我军的战场纪律建设经验。

1962年春,印度当局蚕食中国西南边境,毛主席指示要克制忍让,长期武装共处。指战员普遍对节节退让感到困惑,罗瑞卿指示教育部队务必兢兢业业,戒骄戒躁。1962年10月20日,我军在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指挥下,轻松取得克节朗战役胜利。西藏地区的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罗瑞卿在嘉奖令中表彰参战部队及全体指战员在高原严寒的条件下艰苦卓绝,勇猛善战。为了维护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的传统友谊,毛泽东在做出停火决策的同时,要求将在反击作战中缴获的人员武器装备归还给印度。当时有军官建议将性能较好的装备留下,罗瑞卿得知后指示不要留,全部归还。不仅如此,还组织印军俘虏去我国一些著名城市参观。^[1]此举不仅有效维护了解放军的“战场纪律”,更将解放军的正义展示给全世界。

在对越自卫反击作战中,人民军队面对曾经的盟友,采用了区别于抗美援朝和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的战场纪律。为保护越南人民财产,解放军攻克越南城镇后在商铺上贴封条。对越自卫反击战后,我军对立功的制度重新做了调整,恢复了我军多年来所提倡的立功受奖的制度。

(三)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队纪律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作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显著标志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要求不仅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全党全社会也要加以认真学习。20世纪70年代,由于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无政府主义盛行,许多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被视为“条条框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甚至被废弛。“政治运动”冲击和代替了制度建设,导致部队纪律不严、作风涣散的现象十分严重,人民军队的纪律制度建设遭到严重挫折和损失,基本陷于停滞状态。面对国际复杂局势和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毛泽东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通过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向党内军内传递明确的政治信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关键时刻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战胜艰难险阻、维护团结统一的精神法宝。这一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纪律,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人民军队的建设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军队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人民军队各种规章制度不断发展变化,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却一字未动,成为人民军队永恒的纪律。它是毛泽东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军宗旨。

三、丰富拓展阶段:遂行多样化任务期间军队纪律制度建设与发展

从闭关锁国条件下建军治军到改革开放下的建军治军,人民军队的纪律制度适应形势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改变。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人民军队开始执行多样化任务,走出国门,面向世界。虽然执行的任务不同,但人民军队的纪律作风却是严明一致。根据不同任务制定的纪律制度,极大地丰富拓展了人民军队的纪律制度体系建设。

(一) 驻港澳部队的纪律制度建设

经过长期谈判,中国政府终于从英国政府收回香港的主权。如

[1] 苏振兰:《罗瑞卿大将与对印自卫反击战》,《世纪风采》,2017年第6期,第22—25页。

何组建意义非凡的驻香港部队，党的第2代、第3代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邓小平亲自抓中国政府在香港的驻军规划；江泽民1990年10月在《关于香港驻军准备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上》批示：关键是进驻部队在政治上要特别过硬。^[1]驻香港部队是在“一国两制”特殊环境中驻防，驻军是宣示主权、行使主权的象征，是展示我党我军形象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窗口。部队顺利进驻香港后，部队党委在全体官兵中开展了以树立良好形象为目标的法纪教育，制定了《香港驻军军人道德行为规范》，大到遵守基本法、小到尊重港人生活习惯都做了明确规定，例如为了不扰民，驻军没有起床号。在此经验基础上，人民解放军也顺利进驻澳门。

港澳地区中西文化交汇、历史悠久，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荼毒沉积。历来是西方反华势力的前沿阵地、对华间谍情报中心和“以华治华”战略支点，一直是两种意识形态交锋的第一线。驻军身居闹市，直面“灯红酒绿”严峻考验，腐蚀与反腐败、诱惑与反诱惑斗争十分艰巨。驻军部队充分认清所处特殊复杂环境和面临的形势任务，进一步强化各级居安思危和未雨绸缪的意识，引导官兵从复杂环境中看到拒腐防变

的艰巨性，主动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身处特殊法治环境，坚持野外训练依法申报不扰民，在外执勤维护形象不鲁莽，遵守交通法规，对外交往把握尺度不越线，进出海关依规携带不超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驻军，必须立场坚定，明辨是非，始终把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摆在首位。

（二）中国维和部队的纪律制度建设

1992年中国军队向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派出工程兵大队，参加柬埔寨过渡时期联合国权力机构的维持和平行动，从此中国维和部队亮相世人面前。2005年1月24日，中国第3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医疗分队应邀派代表赴金沙萨，在联合国特派团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分别介绍管理分队的经验：工兵分队担负战备任务，为此从纪律制度上严格实施封闭性管理，这对求知欲强、生性好动的年轻人是一种特殊的考验；而医疗分队从纪律制度上强调治疗病人的人性化，要与病人聊天，调节病人情绪。不同的维和分队采取不同的纪律制度，联合国特派团参照中国分队的经验，修改了《维和人员守则》。

中国维和部队不仅在管理分队上有纪律性，在其他方面同样也有纪律性。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要求，中国维和官兵借鉴国内的经验，创造性地在南苏丹实施了一项“军民共建项目”——免费开办培训班，为难民营里的青年培训工作技能，比如家电维修和简易机械修理等。“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古老的中国智慧和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在遥远的非洲腹地得以体现。青年人掌握了谋生的手艺和技能，就能放下手中的武器去从事生产。^[1]由于缺乏维生素，许多维和人员出现口腔溃疡、牙龈出血等症状，部分国家的维和人员擅自采摘驻地居民的瓜果蔬菜，而中国军人在营区内自己种菜，通过自给自足克服了不良环境带来的影响。“蓝盔”部队在战乱动荡中凭借严格的纪律制度走出一条“和平与建设”之路。

（三）海外护航部队的纪律制度建设

随着国家海上利益的不断拓展以及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加剧，执行海上战略通道护航任务成为我国转型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重要形式。海军舰艇执行护航任务持续时间长，工作强度高，官兵压力大，部队士

[1] 彭利华：《神圣进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建、进驻始末》，《湘潮》，2017年第7期，第4—9页。

气容易出现波动。长时期海上生活,不但要频繁应对海盗袭扰,而且装备检修等工作多。护航官兵获取外界信息的渠道少,长时间缺乏新鲜信息刺激。再加上护航行动远离本土,缺乏岸基依托,综合保障困难。〔2〕这对海军护航编队的纪律制度建设提出了难题。

海军护航编队结合实际,借助心理分析,归纳出远海护航部队士气变化主要有四个周期:高涨期、平稳期、波动期、回升期。高涨期与平稳期主抓使命教育,在航经重要水道时,组织宣誓签名等仪式,引导官兵充分认清护航的重大意义,激发其自我约束的纪律观念。波动期强化战斗纪律教育,激发官兵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战斗豪情。回升期突出外事纪律教育,在靠港休整及顺访阶段教育官兵维护国家、军队良好形象。〔3〕根据不同心理周期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确保护航官兵能够有效履行护航任务。同时围绕各国海军之间的配合、支援等关系,加强对部队协同纪律的教育,严抓协同纪律制度的落实。

四、改进完善阶段:新时期军队纪律制度建设与发展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实力得到飞速提升。但海湾战争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有力支撑,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必须坚持从难从严。

(一) 世纪之交军队纪律制度建设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实力薄弱,广大官兵树立“忍耐”的思想,正确地理解和自觉地服从国家建设的整体部署。为了补充预算拨款的缺额,军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始参与商业活动,但是军队从事经商活动代表一种可能滋生腐败的利益冲突,产生权钱交易,很可能腐蚀军队保卫国家的意志。这个问题是当时条件下的特殊产

物,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海湾战争爆发后,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现代战争的新要求,江泽民指出我军的建设要围绕现代化来展开,这就要求军队的使命任务要从发展壮大转向打赢现代化战争。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全军同志要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这一重要思想,更加自觉地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1997年,江泽民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尽快建立比较健全和完善的国防法律体系。1998年7月,江泽民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做出决定,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必须认真进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得继续从事经商活动。人民军队在加强部队各项训练的同时重视各项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训练,使部队在抢险救灾中发挥更大作用,在震灾、水灾、火灾面前,保卫人民的劳动财产,与此相关的纪律建设也配套展开。我军在世纪之交的一系列纪律制度建设,将军队与经营性企业彻底脱钩,消除了军队经商所导致的潜在隐患,使得军队的主责主业回归到保卫国家这一重要使命任务上来。

(二) 十八大以来军队纪律制度全面建设与发展

十八大以来,中央军委出台了相应规定,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全军深入开展干部工作大检查,纠治选人用

〔1〕 何星:《维和战地上的中国力量》,《解放军报》,2019年12月30日。

〔2〕 周名贵:《远海护航任务中持续保持部队高昂士气的调查思考》,《政工学刊》,2013年第2期,第43—45页。

〔3〕 安晶:《抓好护航行动中教育的落实》,《政工学刊》,2017年第6期,第58—59页。

人上的不正之风；颁布了“禁酒令”，有效刹住了酒桌上的腐败，将“禁酒令”固化为全体军人的行为规范，更体现出全面从严治军的鲜明导向；规定“当兵锻炼”，教育机关领导干部不忘服役初心；下发《关于严格军车管理维护军队良好形象的通知》，开展军车专项整顿，禁止军队使用豪车；全面清查部队房地产，进行违规住房清理；开展全军财务工作大清查，审计财务违规问题和漏洞；颁布依法治军和从严治军的决定，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有偿服务工作。通过全面整治积弊，树立了军队良好形象，提升军心士气，提升战斗力。

新修订的《纪律条令》中新增“纪律的主要内容”一章，首次对军队纪律内容作出集中概括和系统规范。既坚持执纪从严、违纪必纠，充实违反政治纪律、违规选人用人、重大决策失误、监督执纪不力等处分条件，又制定明确规定，纯洁内部关系、净化政治生态。重构纪律制度体系、首次规范纪律内容、完善创新奖励制度、充实调整处分制度、强化责任追究和纪律监督、重新规范表彰和纪念章，重点解决奖惩条件老、少、缺等问题，补齐短板缺项，规范行为边界，突出纪律规定的刚性、严肃性和约束力。新一代《纪律条令》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着眼确保军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保证军队高度集中统一，是维护人民军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的武器。中



十八大后，全军着力推进审计全覆盖，加大重点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审计力度，严格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积极推行经费绩效审计、全程跟踪审计、军地联合审计。图为军队审计部门对某部依法开展审计工作

中央军委先后发布了以禁酒为标志的“六项禁令”和“准备打仗”的通知，以及《关于组织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蹲连住班的规定》、《军队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和《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这一系列精心部署都是加强军队纪律制度全面建设的重大举措。（编辑：郑晓伟、陈欣、江靓）○